

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召开

1932年1月22日至30日,根据中央分局决定,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瞿家湾召开。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7人,代表2.2万多名党员(包括军队中党员2563人)。大会主席团由杨光华、杨成林、万涛、崔琪、贺龙、夏曦等9人组成。

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以来,夏曦顽固地执行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和政策,致使苏区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失误,许多代表希望通过“四大”改变这种状况。22日下午,夏曦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政治报告。讨论时,代表们对夏曦到湘鄂西苏区半年多的工作,提出尖锐、严厉的批评。主要内容是1931年11月省委扩大会上提出的红九师北上、江南苏区失守和红三军向襄北发展的责任问题。其中,万涛、潘家辰等人对夏曦错误的批评意见得到与会代表的认同和支持。公开对夏曦的错误提出批评的代表有70多人,支持夏曦的仅3票。然而,夏曦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立场出发,极力否定万涛、潘家辰等人的正确意见,处境十分孤立。

1月24日,省委派到中央汇报工作的尉士筠,偕同中央派来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工作的关向应到达后,会议发生大逆转。原来中央听了尉士筠汇报后,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立场出发,否定了万涛等人的意见,决定给夏曦以更有力的支持。为此,派关向应来湘鄂西,参加中央分局领导,

并担任红三军政治委员。尉士筠在中央“左”倾路线的压力下,也改变了原来所持观点,极力为夏曦辩护,指责万涛、潘家辰等人。接着,关向应向大会传达中央指示,把万涛、潘家辰等人对夏曦工作中一系列错误所提出的批评意见,说成是“反国际、反中央正确路线”,是“对中央分局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”等等。

1月25日,会场气氛大不相同了,反对目标转移到万涛、潘家辰身上。在中央“左”倾结论下,临时省委的杨光华、崔琪、彭之玉等人都作了拥护中央指示和夏曦报告的发言,大多数代表慑于中央的结论,不再批评夏曦,有一部分人转而与夏曦一道反对万涛、潘家辰。于是,大会接受了夏曦所作政治报告的错误结论,肯定中央分局成立以来执行的错误政策是“真正的国际路线的转变”,所取得的成绩是所谓“纠正立三路线”的成就,指责万涛、潘家辰等人是“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”“立三主义者”“邓中夏的信徒”,其中一部分人是“阶级敌人”,一部分人是“对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没有正确的了解的人”;说万涛等人一是为了改变中央分局和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,助长军事冒险行动;二是要团结一部分“反党分子”,“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,作复仇的斗争”,“企图使临时省委和中央分局对立,动摇党对红军的领导”,“完全是反党活动”等等。结论充分认定中央分局执行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

政策是“完全正确”的,全盘否定周逸群、贺龙等所代表的正确方向。这样,大多数人的不同意见,被夏曦等少数人在破坏党内民主的情况下,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和声势压下去了。

接着,大会通过了充斥“左”倾冒险错误内容的《政治任务决议案》《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决议案》以及《职工运动决议案》等文件。这些文件,会后经过中央分局批准实施。

《政治任务决议案》错误估计政治形势,认为“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,已经转变到有利于工农方面了”,“扩大苏区,将零碎苏区联系成整个苏区”、“争取一、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,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,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了”。决议案规定湘鄂西苏区的发展方向必须是向汉水流域发展,与鄂豫皖打成一片,以造成包围武汉、长沙、岳州的形势。大会后湘鄂西苏区的各项工作,尤其是红三军的行动,完全是按照这个错误方针进行的。

《关于土地经济及财政问题决议案》要求继续贯彻“地主不分田,富农分坏田”和“彻底平分一切土地”的“左”倾政策,继续否定原湘鄂西特委领导的土地革命。决议说,湘鄂西土地平均分配还没有完成,富农土地只是没收了出租的一部分,其他部分还没有动,是非常严重的错误,“是富农路

线的残余”。

《关于职工运动决议案》规定了过高的职工运动,要求“各级工会必须派遣自己的积极分子去领导广大灾民到白区去,为着夺取地主资产阶级的粮食而斗争”。省总工会“以最大努力建立武汉、宜昌、沙市、岳州、长沙、平汉路、武长路、应城盐矿、长阳煤矿及汉长、汉宜轮船工人……的职工运动”。强调这是湘鄂西苏区工会最巨大的任务。

这些规定,都是为了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一总任务提出来的。它的贯彻,无疑给湘鄂西苏区的各项工作带来巨大的、灾难性的损失,以至整个苏区的丧失。

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湘鄂西省委,委员19人。委员有杨光华、杨成林、崔琪、周小康、段德昌、彭之玉、万涛、贺龙、夏曦等19人,候补委员有张宗理、蓝育才、张孝桂等6人,监察委员有刘革非、马武、鲁易、侯蔚文等9人。

1月29日,省委召开第一次全体执委会议,进行分工。杨光华、杨成林、万涛、崔琪、少共书记等5人为常委,杨光华任书记,万涛任宣传部长,杨成林任组织部长,马武任政治保卫局局长,张孝桂任妇委书记,其余同志担任红军及地方工作。

湘鄂西党的“四大”召开后,王明“左”倾错误路线在湘鄂西苏区全面贯彻执行,造成灾难性后果,是湘鄂西苏区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瞿家湾保卫战



(湖北日报记者 陈勇 摄)

1931年6月9日,监河两县地主团防武装500余众,趁红九师西进江陵,收复三官殿、沙岗、普济观、郝穴等地之机,乘船偷袭湘鄂西首府瞿家湾。 留守机关在游击队、赤卫队掩护下,迅速转移到花子墩地区,敌人扑了个空。

当晚,从俘虏口中得知,敌人企图以少部兵力进攻子贝洲,钳制游击队、赤卫队,用大部兵力从瞿家湾背后下湖,包围花子墩,全歼留守的军政人员,并烧毁瞿家湾。留守瞿家湾的负责人彭国材将计就计,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吃掉进犯子贝洲之敌,然后在花子墩布下疑兵,迫使敌人船队钻进设在子贝洲河口附近的伏击圈。

翌日,50多名匪徒进入子贝洲河口,埋伏在芦苇丛中的赤卫队员向敌人投出一排手榴弹,10多个敌人应声倒下。敌人立即用机枪向芦林开火,背后却响起了排銃,又有10多名敌人毙命。敌人吓破了胆,抱头逃窜。这时,冲锋号吹响了,赤卫队在激昂的号声中跃出芦林,把敌人团团围住,近身肉搏,全歼进犯之敌。

子贝洲河口战斗打响的同时,敌主力乘船包围了花子墩。匪徒拼命地打机枪,扔手榴弹,枪声、爆炸声响成一片,整个墩子硝烟弥漫。匪徒们冲上墩子,发现墩上空无一人,心中中计,赶忙回撤,但已经晚了。敌人来路两侧的芦苇丛中,红旗招展,军号此起彼伏。敌人以为红军主力赶到,急忙掉转船头,向子贝洲逃窜。敌先头5条船只撞在赤卫队预先埋在水下的暗桩上,有的翻沉,有的撞损,水道一下子被堵塞,20多条余船进退不得,只好依托船体顽抗。彭国材一声令下,隐蔽在河道两旁的游击队、赤卫队员跃出芦林杀向敌船。

战斗胜利结束,共消灭敌人240多人,缴获各种枪支190多支,子弹数千发,成功保卫了瞿家湾。

抗敌演剧队来新堤

1938年9月23日,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六处机关人员和抗敌演剧队、电影放映队在处长田汉和中共三厅支部书记冯乃超率领下,从武汉乘“风向”轮向长沙转移,途中停歇新堤。

中共新堤支部、新堤战时乡村促进会、新堤抗日后援会在“民乐”戏院举行欢迎大会。会后,抗敌演剧四队主演了话剧《血战卢沟桥》和《大家一条心》。田汉连夜赶写了歌词《新堤真正好》和《团结起来和鬼子拼》,用沔阳小曲谱曲,教小学师生演唱。

《团结起来和鬼子拼》歌词:太阳偏了西,光芒照大旗,一帆风顺到新堤。新堤真正好,赛过神仙岛,鱼虾谷米吃也吃不。可恨鬼子兵,起了大野心,想把我中华一口吞!先占东三省,后把全国侵,杀人放火又奸淫。攻进广州城,武汉正吃紧,危在旦夕化灰尘!新堤同胞们,万众齐一心,团结起来和鬼子拼!收复我中华,完全靠大家,男女老少起来吧,起来把敌杀!

9月24日,抗敌演剧四队继续在“民乐”剧院演出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《难民曲》《打鬼子去》等话剧,抗敌演剧一队、九队的队员在大街和码头举行化装表演。化装表演结束后,范元甄、任光等人分头教市民唱歌曲《新堤真正好》,田汉用沔阳小曲教学校师生演唱《团结起来和鬼子拼》。

抗敌演剧队的到来,进一步激发了新堤人民的爱国救亡热情。

洪湖水上赤卫队歼敌



《洪湖赤卫队》剧照。

船只驶近时,张家坊游击队的机关枪响了,船上10多个敌兵应声倒下。跟在后面的敌船见先头船只被轰击,又听见哒哒的机关枪声,顿时乱了阵脚,慌乱中有6艘木船驶进水道两侧芦林,进退不得。埋伏在芦林中的水上赤卫队銃船立即向前,队长瞿生炳一声令下,几十杆

抬銃同时开火,铺天盖地的铁子子把6艘船上的敌兵打的鬼哭狼嚎,杨光昭亡令所剩10艘木船后撤,逃之夭夭。水上赤卫队声威大震。

洪湖苏区群众性文化活动

《苏武牧羊》小调,在群众中广为传唱:“工农,世界主人翁,我们的血汗,几乎要流尽。衣与食、住与行,我们所造成。权位与幸福,倒寄生虫。世界创造者,反作罪罪人。封建制度、资本主义,一律要铲平。”正如谢觉哉所说:“特别是唱新民歌,一传十、十传百,党的政策和鼓动口号通过新民歌很快地传到每个人的心里。”

新剧社是苏维埃政府倡导的一种新戏剧的业余演出团体,要求各区建立一个新剧社(因某种原因,有的区未建立),每个剧社人员视情而定,开办费由政府津贴。新剧社根据斗争形势和当地实际,自编自演。有的剧本则由省、县文委会发给。如省文委编写的《活捉张辉瓒》,在峰口峰乐剧场演出,深受群众欢迎,场场座无虚席。不少领导干部,如周逸群、邓中夏、熊瑾玎(省文化教育部部长)乐于文艺创作和登台表演。此外,新剧社还上演不少传统

剧目。苏维埃政府在中心集镇设立演讲社,要求“每日须规定明了政治和了解‘主义’的同志演讲一次”。凡重大纪念日,如“二七惨案”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“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”“广州暴动日”,苏区都要举行群众集会,散发宣传大纲,进行通俗演讲和化装演讲。化装演讲是根据演讲的内容,化装成不同的人,边讲边做动作,绘声绘色,听众十分踊跃。不少党政领导亲自参加这种化装演讲,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就先后在峰口、沙口进行演讲。

苏区文艺工作者,还利用花鼓戏、三棒鼓、敲碟子、打莲花闹、道情、渔鼓、高跷、龙灯、采莲船、皮影戏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游艺形式及各种韵文、小词,配以新调,热情颂扬共产党、红军和苏维埃,歌唱革命斗争的胜利,讴歌工农翻身的幸福生活。峰口皮影剧社根据

红军攻克峰口的战例,编写“打峰口”的剧本,受到观众好评。

每逢大的传统节日和县、区召开祝捷大会,都要组织盛大庆祝活动。一般有龙灯、龙舟、采莲船、舞狮等表演。特别是放河灯和提灯会,群众更喜爱。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,洪湖苏区群众都要放河灯。河灯系彩纸扎成,形似荷花,灯中装油纸芯和传单,灯上写有标语口号,放灯时敲锣打鼓,唱起放灯歌。一盏盏河灯飘浮在水面上,顺风飘向白区,宣传党的主张,扩大苏区影响。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时,洪湖沿岸灯火一片,数千名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,手提形似莲花、鱼虾、花篮、金瓜、青蛙、镰刀斧头等花灯,灯上书写“热烈庆祝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”等标语口号,有如灯的海洋。直到第二天清晨,方告结束。类似这样的提灯会,洪湖苏区中心市镇时有举行。

洪湖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

1931年6月,蒋介石在武汉成立“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”,调集63万兵力,组成左、中、右三路军,对湘鄂西、鄂豫皖、湘鄂赣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反革命“围剿”。其中左路军由湖北省主席何成浚任司令官,徐源泉为副司令官兼总指挥。划归左路军指挥的有洪湖地区全部鄂军,敌长江上游“剿匪”代总指挥王陵基指挥的川军,以及新增加的国民党第十三师万耀煌部,共10万余众,锋芒直指洪湖苏区。

8月10日,徐源泉调整兵力部署,将担任“围剿”任务的军队编成第三、第四两个纵队,包括鄂军第三十四师、四十一师、四十四师,独立三十七旅、三十八旅,第十军特务团及新三旅主力等,统由王陵基指挥。其余襄南驻军及在华容一带的湘军第十九师,一律担任堵截任务,江面上则派舰艇巡逻,阻止红军南渡。

这时,夏曦为了取得粮食等物资,以便在洪湖苏区作战,命令红九师在熊口、莲花寺一线迎敌,七、八两师进攻沙市、江陵和草市。

8月13日晨,红七师攻入沙市街头后,遭敌

阻击。下午,敌3个团从岑河口、资福寺、鸦角庙赶来增援,再战不利,红七师撤至龙湾、熊口一带。红八师攻入草市,歼敌500多人,获枪200多支,随即向荆州逼进,以阻止敌人向沙市增援,相机夺取荆州。但因敌据城固守,被迫与敌隔护城河对峙。这种对敌人设防城市进攻是没有把握的,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,但红三军付出了巨大代价,“借粮”目的也未达到。贺龙、段德昌等人提出红三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,在运动中消灭敌人,但夏曦顽固地坚持己见,决定兵分两路,“两个拳头打人”:调红七师和警卫师一个团固守洪湖苏区,以阵地战阻击敌人;令红八师、红九师和警卫师另一个团,由贺龙、关向应率领,向襄北牵制敌人。

于是,红七师和警卫师一个团由夏曦指挥,继续实行分兵堵口,阵地设防。在强敌压迫下,节节败退。不几天,敌人就占领了白庙以西、东荆河以北地区。随即从白庙、施家港、北口等地同时强渡东荆河南进。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南犯,沔阳县委集中县、区游击队千余人枪,整编

成沔阳独立营,奉命在东荆河南岸构筑防御工事“死守”,苦战七天,付出了惨重代价。

8月24日,敌占领峰口、府场,沔阳县委、县苏维埃政府撤至沔东南郑道湖、下丰岸、坝潭等湖区隐蔽。9月2日,敌占领刘家场、三官殿,逼近中央分局和省委所在地瞿家湾。而此时,夏曦对单纯防御、固守作战屡遭失败的错误策略毫无醒悟,仍然坚持分兵把守,命令七师第十九团、二十一团固守福田寺、太平桥,二十团守柳关,沔阳独立营分兵固守新河口、小沙口、李家口。9月3日,敌人以4个旅分三路夹击红七师,下午,瞿家湾、小沙口、柳关相继失守。二十团伤亡惨重,全团只剩下一个多营兵力。在保卫洪湖苏区的战斗中,红七师损失非常严重,师政委鲁易及3名团长、1名团政委血洒洪湖,壮烈牺牲。

扼守新河口、小沙口的沔阳独立营二连,英勇顽强击沉了敌军两艘汽艇,以劣势装备打退国民党正规军一次又一次进攻,终因寡不敌众,奉命退入洪湖隐蔽。

敌人进入洪湖沿岸地区后,疯狂地破坏和烧杀。洪湖苏区党政机关、红军医院、被服厂、兵工厂等因未作撤退和转移准备,全部被敌人捣毁和焚烧,损失惨重。敌人所到之处,尸横遍野,房屋焚尽,财物劫空,实行灭绝人性的“烧光、杀光、抢光”的“三光”政策。

9月7日,敌人占领宋河。夏曦带领红七师余部西入江陵沙岗。这时,枪不满千,无力继续与敌人作战。原计划八、九两师到襄北牵制敌人,亦因川军郭勋部8个团和鄂军第十三师、四十四师前堵后追,未能渡襄河北上,而活动于荆、当地区,到9月才转移到钟祥、京山以北的大洪山一带,未起到牵制进攻洪湖苏区之敌的作用。夏曦的“两个拳头打人”,结果是一个拳头精疲力尽,另一个拳头难有作为。

红七师在沙岗地区集中后,敌人随之扑来。夏曦见沙岗不能守,遂令七师北上,与八、九两师会合。

隐蔽在郑道湖、下丰岸、坝潭一带的沔阳县干部和独立营千余人枪,依托湖区分散的台

墩和茂密芦林,白天潜伏,夜间上岸,与敌人捉迷藏,伺机袭击小股零星敌人,在湖中坚持了七个昼夜的斗争后,县委将独立营与县区干部合编为沔阳独立团,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鞠鞠仁率领,乘敌一意,日夜兼程,于9月中旬赶到沙岗。湘鄂边苏区失守后,湘鄂边特委率独立团及地方机关撤离苏区,向洪湖转移,于9月中旬,与夏曦率领的中央分局机关和部分地方武装在沙岗会合。夏曦将以上仅存的地方武装与湘鄂边独立团合编为独立师,由湘鄂边独立团团长王炳南任师长、卢冬生任政委。

10月上旬,夏曦带独立师向西突围,与红三军主力会合于随县大洪山一带。洪湖苏区内其余零星武装,一夜700多人,编成独立营,在崔琪率领下,突围过长江,转移到华容东山一带,在东山战斗中,崔琪饮弹身亡,队伍被打散;另一股200多人,在杨光华率领下,突围到江陵长湖一带,坚持斗争,不久杨光华赴上海寻找中央,队伍解散。至此,洪湖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斗争完全失败,洪湖苏区丧失。